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 新民说

梁启超 著  
宋志明 选注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民说/梁启超著;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2-0

I. 新…

Ⅰ. ①梁…②宋…

Ⅱ. ①梁启超-文集②哲学思想-研究

③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Ⅳ. ①B259.12 ②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0,000 印张:7  $\frac{1}{2}$  插页:5

印数:1—1,608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刘 杨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孙东岩

---

定价:7.80元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 编 序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宝库中，有一颗璀灿的珍珠，曾经照亮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心扉。它就是梁启超撰写的《新民说》。

### (一)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23日出生在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梁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主持过乡里都团的事务。其祖父梁维清肆志于学，致力举业，但仅及秀才，曾任新会县教瑜。其父梁宝瑛奋斗一生，竟连秀才也没有考中，只得作一个教授乡里的私塾先生。其母也粗知诗书，对子女管教甚严。

梁启超作为长子，自然是全家的希望之所在。他从小聪明颖慧，五岁就开始识字，六岁读完《五经》，九岁便能写出洋洋千字的文章，被誉为神童。十岁以前，在家受教，未进学堂。他回忆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

出就外传。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sup>①</sup> 在祖、父两辈人的催促扶掖下，梁启超学业大有长进。十一岁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广东学政叶大焯的赏识。十二岁入广州学海堂就读，十六岁中举。梁启超少年得志，当时成为新会县远近闻名的才子。

正当梁启超在科举道路上突突竞奔的时候，忽然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所吸引，实属始料所未及。1890年，即在他中举的第二年，他拜康有为为师，成为康氏门下最为得意的高足。在康氏的陶冶下，梁启超踏上一条新路，从一介热衷功名的士子变成致力于维新变革的政治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

1894年6月，梁启超跟随乃师赴京参加会试，正值甲午战事。他目睹亡国的危险在即，再也无法安心于科举之业了，毅然投身到变法图强、维新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已签定的消息传到北京。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震动朝野上下。接着，康梁师徒又组织“强学会”，办报纸，写文章，大造舆论以推动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担任《时务报》总撰述，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反复强调变法势在必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

---

<sup>①</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来缚之，驰骤之。”<sup>①</sup> 梁启超的文章挥挥洒洒，笔端常带感情，引起极大的反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胡思敬介绍，“当时《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履霜录》卷四）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培养人才、推进湖南新政实施等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发一系列命令，宣布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废八股、裁绿营、削冗员、试策论、办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和商会、倡实业、译西书、办学堂、开报馆等项。梁启超的才华和卓识受到光绪的青睐，亲自召见他，赐与六品卿衔，命他专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光绪还批准了他提出的关于设立编译学堂、奖励工艺和奖制新器等许多奏议。是年为旧历戊戌年，这次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变法仅维持百余日，故又称“百日维新”。同年9月22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悍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拿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梁亡命日本，一些有关新政的法令皆被废除。

梁启超避居日本以后，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广泛传播西学，在思想启蒙

---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人们赞誉为“舆论界骄子”。他曾一度脱离康有为的羁绊，对革命派表示同情，主张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合作，共同进行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可是，不久又回到乃师的窠臼，追随康氏组织保皇党并挑起同革命派的论战。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一度成为保皇党的思想阵地。他荒谬地宣称当时的中国“不必革命”、“不忍革命”、“不能革命”、“不可革命”，这些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孙中山、章炳麟等人的批驳。

辛亥首义以后，清帝退位，梁启超一时成为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他以改良派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在国会内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相颉颃。他曾任熊希龄为总理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并成为此内阁的灵魂人物。“第一流人才内阁”垮台后又任币制局总裁，不久又辞职。的确，他曾依附过袁世凯，曾寄希望于段祺瑞，但绝不能把他同封建军阀相提并论。他维护共和政体的态度是坚决的。当袁氏帝制自为、倒行逆施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表示反对，并且毅然参加讨袁的护国战争。在粉碎张勋复辟时，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初年，军阀纷争，政坛混乱，国无宁日。梁启超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政界不可能有所作为，遂于1917年宣布退出政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堪称传世之作。他写出

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法律、文学等方面的文章或专著，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和著述在中国近代学术界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他是一位思想敏锐、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宣传家，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问家。“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他每年著述总量近40万字，给后人留下的《饮冰室合集》长达148卷，约1400万字。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了解中国的“昨天”，提供了翔实的思想材料。

## （二）

《新民说》写于1902年到1906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新民丛报》，后来将二十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梁启超思想以善变著称，典型地表现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时代特征。他表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相信这样做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新民说》大部分篇章写于梁启超思想最进步时期，个别章节流露出他转为保皇党以后的思想情绪。

梁启超到日本后，思想面貌、知识结构、学术风格较之戊戌变法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虽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甚至康梁并称，但思想却没有跳

出康有为的窠臼。他遵循今文经学的路数，作“托古改制”呼声，虽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但并没直接接触到多少西方的学术思想。他自己也承认，“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sup>①</sup>到日本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学术视野的开阔，梁启超的思想陡变。正如他自述的那样，“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sup>②</sup>。这时的梁启超已突破康有为的藩篱，已突破今文经学的局限。他兴高采烈地吞噬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谈卢梭、孟德斯鸠、伯伦知理……，没有这样的思想转折，梁启超不可能写出《新民说》这部启蒙杰作。

梁启超写作《新民说》正是针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的，因而很快便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顽固派气焰嚣张，利用手中的权力穷凶极恶地向进步力量反扑，极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大肆搜捕维新志士，摧毁改革派的各种言论机关，查封各种宣传新思想的报章杂志，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顽固派所制造的文化专制并未能遏止住启蒙思潮的涌动。处在高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苦苦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对顽固派的仇恨愈益加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振臂呼唤“新民”出世，不啻“于无声处听惊雷”，当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响。

---

① 《梁启超书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

鉴于文化高压政策没有奏效，顽固派改变策略，从1901年开始玩弄起假维新的把戏来，对于言论的钳制表面上有所放松。国内外舆论界一时活跃起来，出现《亚东时报》、《中外大事报》、《国民报》、《五洲时报》、《译书汇报》、《开智录》等一大批宣传革命或改良的刊物。在这些刊物中，最有生气的还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他抓住有利时机，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可以说领风气之先，很受读者的欢迎。1901年清廷颁布改变科举制度、改八股、试策论的上谕，使那些在科举道路上竞奔的童生、秀才、举子们一时不知所措，顿生学问饥荒之感。梁启超及时推出《新民说》，以他那“饱含感情”的笔触，拨动这些人的心弦，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了士子们的必读教材。

在梁启超写《新民说》的时候，改良派已开始走下坡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死胡同。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另辟蹊径。革命派应运而生，担负起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改良派独领风骚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面对革命思潮的兴起，康有为等人持反对态度，仍抱着君主立宪的老路不放。梁启超与乃师有所不同。他在写《新民说》时，虽没有放弃改良主义主张，但却没有采取反对革命的偏狭态度，而对革命思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同。他认为革命与立宪可以并行不悖，在反对顽固派这一大目标上，两派可以携手并肩。革命固然会

造成破坏，不过这种破坏又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疾呼：“不破坏之建设，未能有建设者也。”梁启超同情革命、礼赞破坏，受到康有为的指责，但他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有根据的，无可厚非。他在致徐勤的信中写道：“长者（指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深信中国之万不革命。”<sup>①</sup>他并不以师训为然，表示爱吾师，尤爱真理。正因为梁启超对革命抱着认同感，所以当改良派走下坡路时，他写的《新民说》充满激情，仍能保持思想魅力。不过，梁启超对革命的欢迎如同叶公好龙，当革命高潮真正到来时，他终于动摇了，又折回乃师的麾下，唱起保皇调，变成革命派的论敌。他收起革命排满、破坏暗杀一类的词藻，又拣起君主立宪的陈词，领了十年左右风骚的梁启超逐渐失去往日的风采。

### （三）

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是《新民说》通篇的主旨。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就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这种人有强烈的上进心，热爱自由与民主，善于求强致富，遵守法律秩序，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态。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旧时代的老式人格而言的，梁启超所倡导的其实就是一种近代资产阶级的人学观念。

---

<sup>①</sup> 《梁启超书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

在梁启超看来，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从上面来说，固然是顽固派从中作梗；而从下面来看，亦同国民素质不佳有直接关系。在数千年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是自由，其他人毫无自由可言，只有君主一人大权在握，人民毫无权力可言，这势必造成国民性的扭曲。失掉自由、民权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养成奴隶性，养成依附心理，养成不健全的人格：人人但求自保，缺乏团体观念，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四万万之众犹如一盘散沙！这样的国民同如狼似虎的列强相遇，焉有不败的道理？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痛切陈词：“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sup>①</sup>他站在救亡图存的高度，发出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呼唤新民快快出世。在他急切的呼唤声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

怎样才能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造就一代新民呢？梁启超主张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翻专制主义政体，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中国国民性扭曲的病因。他大声疾呼：“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

---

<sup>①</sup> 《梁启超书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

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sup>①</sup>他认为，政治解放是造就新民的首要前提。只有废除专制政体，实行民主立宪，才能使扭曲的国民性得以恢复，才能为新民的问世铺平道路。从这里反映出，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充满着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它是一支射向君主专制制度的利箭。

第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培养近代人应有的品格。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应当向那些已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学习。他最钦佩的民族是盎格鲁撒逊民族，其次是后来居上的日本民族。在梁启超看来，这些民族之所以能把自已的国家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首先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股“近代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国家至上的团体意识；敢于进取、敢于冒险的竞争意识；维护权力、克尽义务的法律意识；自由、自治、进步、合群的公德意识。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国民所不具备的。因此，“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sup>②</sup>梁启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sup>③</sup>他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西方近代文化，阐扬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尚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击一猛掌，无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

①②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第三，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固有的民族精神。梁启超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特别强调，“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sup>①</sup>。而应当把“淬厉其所本有”同“采补其所本无”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新民的正途。他认为，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但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确有精华。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公德的论述比较少，而关于私德却有许多精辟之论。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把它发掘出来，加以发扬光大，对于新民的成长大有裨益。据梁启超的研究，在儒家的伦理学说中至少有三点是新民应当遵循的。一是正本，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二是慎独，严格自律修身，三是谨小，大节不亏、小节亦不放松。他认为这三点都是新民仍须具备的品格。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时，梁启超既反对醉心西风，也反对厚古薄今，这是一种比较健全的文化心态。

无庸讳言，梁启超向往的新民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人格形象，他的《新民说》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例如，他不加批判地赞扬民族扩张主义行径，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帝口号，诬称义和团运动为“瞎闹”，称扬破坏而又“恐秩序破坏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等等，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谬见，应当严肃地加以批判。但

---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是，总的来看，瑕不掩瑜，《新民说》仍不失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文库中的名篇佳作。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这个道理引申到今天也就是：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读《新民说》仍会感到心灵的震颤，如触电然。

#### (四)

本书主要根据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间参照原文发表的《新民丛报》以及有关书籍整理编注的。原文仅有断句，未加标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加上新式标点，并且作了必要的注释。对于原文中明显的技术性错误均直接改正，不另注明；疑有讹误处则在注释中说明。梁启超的论著复杂多变，如何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实质，确是一难题。由于我学力未逮，在编注过程中疏漏纰谬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宋志明**

1993年10月序于

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三楼顿悟斋